

徒步横穿阿富汗
内陆之旅

第 1687 号 本期八版 2017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一

阅读前沿

汪耀华——夏瑞芳——中国第一出版商的 CEO
陈尚君——张钊与河南赈灾
曹正文——听罗竹风讲「编辑应是杂家」
郑渝川——现代主义历程：思考和躁动永不停歇

每周一书

《尼伯龙根之歌：
德国民间史诗》曹乃云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定价：78 元

这部典藏本德语英雄史诗，由翻译家曹乃云先生根据荷恩埃姆斯·拉斯贝尔克版译出。

这部英雄史诗是德语文学的起源之一，民间文学蓬勃的生命力闪现其间，在传奇故事中并没有明显的道德说教，有的只是人性的自由绽放。

这部史诗内容源于欧洲历史上的许多材料和典故，气势磅礴，内容包罗万象，叙事叙理丝丝入扣，展示情节前后呼应，读来让人回肠荡气，难以忘怀。瓦格纳根据尼伯龙根的传说创作的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亦是歌剧的传世之作。

黄蜀芹执导《孽债》二三事

叶辛

在中国电影史上，黄蜀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。她出生于艺术世家，追求艺术上的鲜明个性，提倡“小题材大感情”，作品屡获国际、国内大奖。

最近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《写意光影织妙镜·黄蜀芹》，这是一部全景反映黄蜀芹人生际遇、与电影结缘过程的人物评传。书中很多细节都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，包括黄蜀芹对影、视、剧艺术的探索思考，她的家庭生活、与师友的交往、拍戏细节、与众明星的合作等等。

本报特约请与黄蜀芹导演合作过电视剧《孽债》的作家叶辛，写写他和黄导的交往。



2007 年，为录制《星梦奇缘 30 年》之《孽债》节目，导演黄蜀芹和编剧、主演等在西双版纳重聚。

热热闹闹的上海书展结束后，我接到上海文联的一个电话，说文学艺术院和电影家协会要搞一个活动，祝贺黄蜀芹传记的首发并举行她的艺术成就展，同时开一个小会，谈一谈和她的交往。

我和黄蜀芹认识的时间不长，细细一回想，竟也有二十多年了。我们之间打交道，就是因为长篇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，前前后后有了一些交往。从不多的这些交往之中，也能看出黄蜀芹作为一个导演、作为一个女性独到的性格。

《孽债》是我于 1990 年调回上海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。

文学界、出版界的一些老同志、老朋友都对我说，这是一次“亮相”，你得慎重一点，我们可不愿意看到你是坐在作家协会办公室领导的位置上亮相，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亮相，作品的亮相。

因为参与了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，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交给和我很熟悉的《收获》杂志，又因为我最早责任编辑老谢亲自上门索稿，我把小说交给了《小说界》杂志发表。

没想到《孽债》一发表，仅仅是上半部分，就引得七八家影视部门找上门来，说这是很好的影视题材，要改编。

我却把小说的改编权交给了云南电视台。为此一位领导还批评我，你怎么调回上海了还把原著改

编权交给插队落户的地方。他把我

在贵州插队，当成是在云南了。其实不然。在我调回上海之前，云南台一位姓杨的导演，坐了一夜火车，来贵阳找到我，说台领导讲了，云南电视台这些年什么栏目都出彩，唯独从来没有像样的电视剧拍出来，故而把他派到贵阳来找我，说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两部长篇小说，改编成电视剧后都有广泛影响，还得了奖，下一部作品写出来，一定要交给他们改编拍摄。这位杨导走进我家的时候，正是中午十二点刚过，我问他吃过饭了吗？他说没吃，但你别招呼我吃饭，给我下一碗清汤面就行，别放佐料，不要放辣椒，我正在拉肚子。不好意思，我还要借用一下你家卫生间。

吃面条的时候，我问他：你正在生病，为什么忙着出差？

他说台领导开会一定下来就催我成行，我也一心想组到个好题材，就带着药上贵阳来了。遂而他就问我正在写个什么东西？

我简略讲了一下《孽债》的构思。他当场表示，我是北京到云南的知青，一言为定，你的小说写出来就交给我们台拍，我作为导演说话是算数的。

回到昆明，他给云南台领导汇报之后，又给我打来长途，说台领导也认可他的表态，这件事就以君子协定的形式定下来了。

杨导抱病出差专程来我家这事儿给我印象很深，小说发表之

后，我就给他们寄了一本。

没想到云南台领导在一周之内就给了我回音，还明确告诉我，希望我在完成小说之后，立即着手剧本改编。并且说，杨导已经调到北京电视台，他们研究了又研究，想聘请黄蜀芹导演来导这部戏，同时台里成立个导演组，好好向黄导学习，让她也带带内地同行。务请我帮忙联系，一旦黄导答应，他们会及时飞来上海，当面聘请她。

那时我和黄导仅在文艺界的会议上见过几面，不熟悉，于是我说：我试试。

也巧了，这个电话之后没几天，在岳阳路上的越剧院那个院子里，我碰到了黄导，于是走过去给她说了这事儿。

她一听便问我：“是哪个作品？”

我说是《孽债》，发表在《小说界》上的，我过几天给你一本。

她说是讲几个小孩来上海找父母的那小说吗？

我说是啊！

她说那你别给我了，我读过。你给他们回话吧，我同意干这活。我没想到她这么爽快，于是回家后就给云南台管电视剧的孙台长打了电话。

孙台长更是迫切，没几天就带人一起来到上海，约黄导在市中心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个饭，当面发出了邀请。黄导欣然答应，并且明确表示，她当导演，会带着自

己合作多年的团队。云南台领导也表示尊重黄导的选择，只希望她在导演组里带带台里的导演，给他们个学习的机会。黄导表示完全可以。

这事儿似乎就此定了下来。谁知好事多磨，当小说全部发表，并出版了三万册单行本时，云南台给我打来了抱歉电话，说由于种种原因，拍不成《孽债》了。

我当即在电话上表示，为了把小说改编拍摄权给你们，我还受批评了呢！这样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在上海联系摄制单位了。

第二天我就给黄蜀芹的妹妹黄海芹打了电话，她那时是上海台管文学剧本的主任；在看到《孽债》小说的当月，她就问我能否让上海台拍这个剧，我说已经口头答应云南台了，她表示十分遗憾。这会儿我给她电话，希望她看看我的本子，她说第二天中午到作家协会办公室来取。（幸好我给云南台的是复印稿，留下了原稿。）

黄海芹慢慢悠悠走进作协办公室，我把《孽债》剧本原稿交给了她。她当场从兜里掏出一万块钱来，并且作了说明：现在上海电视剧本的行情是一集一千五百块，台里作了研究，考虑到你有过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，决定给你最高的，每集二千块。照计划拍的二十集算，总共该给你四万。现在给一万，开拍时给到一半，完成拍摄付清。你有意见吗？有意见我可以带回去，再研究。（下转第二版）